

红色基因融入职业院校劳动教育路径探析

■ 李 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明确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职业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新时代呼唤的“大国工匠”,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更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如何将红色基因注入劳动教育,使其在职业院校的育人实践中产生化学反应,以实现德技并修、铸魂育人,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一、红色基因与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内在耦合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标识,蕴含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职业院校劳动教育则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承载着以劳育人的时代使命。两者在价值内核、育人目标和实践功能上具有内在耦合性。

(一)价值同源:红色基因与劳动精神的基因谱系契合

红色基因与劳动教育在本质上同源。红色基因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实践之中。从井冈山的“挑粮小道”到南泥湾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的科技攻关,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始终流淌着劳动创造世界的红色基因。

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劳动教育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培育。本质而言,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与红色基因中蕴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等要素在价值维度上高度契合。传承红色基因,实质上是对劳动教育精神内核的溯源与升华;开展劳动教育,则是让红色基因在具体的职业实践中落地生根,二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职

业教育的精神底色。

(二)目标同向:立德树人与德技并修的育人旨归契合

红色基因融入职业院校劳动教育,首先要厘清两者的育人旨归。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的是“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一方面,红色基因的传承旨在从思想上固本培元,通过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解决为何劳动、为谁劳动的问题,培养学生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政治品格。另一方面,劳动教育侧重于从实践中强筋壮骨,通过出力流汗、磨炼意志,解决怎么劳动、如何成才的现实问题,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红色基因与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统一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目标。红色基因融入劳动教育,就是将政治素养培养与职业技能培育有机结合,从而造就既有红色基因底色、又有专业技能的时代新人。

(三)功能互补:精神补钙与实践淬炼的行动逻辑契合

在育人功能的发挥上,红色基因与劳动教育构成了灵魂与载体的互补关系。红色基因作为先进的精神文化形态,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中发挥着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的功能。能为学生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强大的意志力和责任感。而劳动教育则为红色基因的传承提供了生动的实践场域。红色基因不仅存在于书本和纪念馆中,更应当体现在车间实训的每一次精细操作中,体现在社会服务的每一次真诚奉

献中。

职业院校独特的工学结合实践环境,是红色基因从理论形态转化为行为形态的最佳情境。通过劳动教育,红色基因得以具象化;依托红色基因,劳动教育得以崇高化,二者互为支撑,共同作用于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

二、红色基因融入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逻辑要点

如何将红色基因与职业院校具体的劳动实践环节进行有机融合,是红色基因传承产生实效的关键,也是当前教学实施中的难点。红色基因融入劳动教育职业院校应避免生硬嫁接、机械植入,方能实现价值观的有效引领。

(一)瞄准不同劳动形态的特定育人使命

红色基因融入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不同劳动形态的任务与使命,各有侧重地进行精准滴灌。

对于日常生活劳动,应重点融入红色家风与优良传统,引导学生体悟革命先辈的清廉节俭作风,重点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道德品质。对于生产性劳动,应重点融入红色工匠与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要结合专业特点,深入挖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劳模事迹,重点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科学态度以及技能报国的职业责任感。对于服务性劳动,应重点融入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要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引导学生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劳动实践中,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重点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服务意识。

(二)在劳动教育内容上作自然延伸

职业院校的劳动教育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灌输,本质特征在于实践性。因此,红色基因的融入不能脱离具体的劳动实践内容空谈,而应在劳动技能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自然延伸。

这意味着,教师不能为了讲红色故事而把实训课变成历史课、政治课,而应寻找技能点与精神点的共振区,自然融入红色基因。这种融入应当是即时的、情境化的,要求让学生在劳动体验中,自然而然地感悟到红色基因蕴含的专注、坚守与担当,从而实现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同的升华。

三、红色基因融入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现实路径

扎实推进红色基因融入职业院校劳动教育,还必须从资源聚合、方式创新、机制健全等维度着手,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合实践路径。

(一)聚合资源,筑牢“红色+技能”的育人阵地

职业院校应打破校园围墙,推动红色资源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资源的深度整合。一是要盘活区域红色资源,拓展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的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红色旧址等资源,建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同时,应设计特色的劳动项目,让学生在真实的红色场域中实现劳动教育。

二是要挖掘行业红色底蕴,建设具有红色气质的实训中心。职业院校的实训基地是劳动教育的主要场域,要在实训中心、名师工作室的建设中,植入行业发展史中的红色基因。通过打

造红色基因传承文化墙、设立红色工匠宣传栏等,营造浓厚的“红色+”劳动文化氛围。

(二)创新载体,激活“体验+沉浸”的教学模式
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的认知特点,红色基因融入劳动教育必须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多样化载体,增强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一是开展“红色+”的项目式劳动教学。职业院校应结合岗课赛证融通要求,开发融合红色基因的劳动实践项目,实现专业技能训练与红色基因传承的有机统一。二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开展沉浸式红色劳动体验。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云端红色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在虚拟仿真环境中“亲历”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劳动实践过程。通过沉浸式体验,跨越时空阻隔,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悟劳动创造幸福的真谛,增强对红色基因的情感认同。

(三)健全机制,构建“协同+评价”的保障体系

红色基因融入劳动教育是系统工程,必须建立长效机制,确保融合育人实效。一是建立“双师”协同的师资培育机制。一方面,聘请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担任兼职劳动教育导师;另一方面,推动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实习指导教师结对。通过集体备课、联合教研,挖掘专业课程中的红色劳动元素,形成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的协同育人合力。二是完善红色基因+的劳动教育评价机制。应改革单一的技能考核方式,将红色素养纳入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在评价学生的劳动成果的同时,重点考察其劳动态度、协作精神、社会责任等指标。同时,对在劳动教育实践中红色基因传承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表彰激励,树立德技并修的鲜明导向。

基金项目:2025年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红色基因融入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ZJCV2025A42)。

(作者单位:嘉兴技师学院)

让红色基因在指尖传承

——新媒体环境下小学红色文化教育的创新实践

■ 陈 欢

在当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大思政课”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为小学生打好鲜亮的精神底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肩负的神圣使命。然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在智能手机、短视频和互动游戏中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如何顺应时代潮流,主动借力新媒体,打通一条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的新路径,让崇高的革命精神在全新的语境中重新焕发蓬勃的生命力,是我们每一位一线教育工作者要思考的问题。

一、理念破冰:从单向讲述到双向互动

开展新媒体红色教育,首要的是实现教育理念的深刻转变。小学低年级学生正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但对色彩、声音和动态画面格外敏感;他们可能难以理解抽象的政治理念,却能够通过具体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当他们习惯于动态、交互、趣味的视听体验时,传统红色教育中相对静态的讲述与单向的灌输,便面临着吸引力不足、共鸣感不强的现实挑战。

基于以上学生身心特点,我们一线教育工作者在开展红色教育时要从以往侧重于宏大历史叙事的知识传递,转向更贴近儿童认知与情感世界的价值引领。尝试将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化作一个个有温度、有细节的英雄小故事;将抽象的革命精神,融入学生可见、可感的场景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借助新媒体的特性,将学生从被动的聆听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共情者,引导他们在主动的探索

与创造中,完成对红色精神的内化与认同,实现一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

二、路径探索:构建浸润式新媒体教育生态

在具体的实践探索中,我着力构建一个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教育新媒体生态。

1.声影相融:打造可听可感的移动课堂

声音,是触动人弦的钥匙。笔者依托校园广播站和班级微信群等线上平台,创办了由学生自主担任主播的“红领巾电台”。当学生用稚嫩而真诚的嗓音,讲述《鸡毛信》的惊险或《小英雄王二小》的机智时,红色的种子便随着声音悄然播撒。视觉的冲击力同样不容小觑。我们精心筛选了一批适合低年级学生观看的党史纪录片与动画片,并以虚拟现实(VR)技术组织“云端”研学,让学生“走进”革命纪念馆。此外,我们积极推动家校协同,鼓励学生将作品带回家中分享,通过班级群展示,从而将红色教育的影响力从校园辐射至家庭,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的良性循环。

2.寓教于乐:在互动体验中深化价值认同

为了让教育过程更具趣味性,笔者巧妙地將游戏化思维融入其中。线上,我们设计“红色知识闯关”游戏,让学生在寓教于乐的竞争中巩固知识;线下,我们发放“红色任务卡”,鼓励学生采访身边党员或家庭共唱红歌。完成任务的喜悦与获得的电子徽章,成为激励他们持续参与的强大动力,让红色教育从“要我听”转变为“我要参与”。

3.内生外化:从内容消费者到意义创造者

教育的最高层次在于激发学生的主动创造。我们鼓励学生从内容的消

费者,转变为意义的创造者。在深入了解英雄事迹后,我们举办“我给英雄画张像”数字绘画展,学生用平板电脑描绘出心中的英雄。我们还组织小组进行童谣编创或微型剧本创作,并拍摄成短视频。从构思到合成的全过程,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更全面锻炼了他们的综合素养,让红色基因在创造性的输出中真正得以活化。

三、关键反思:让技术之“器”承载育人之“道”

在如火如荼的实践背后,我们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坚持内容为本的原则,确保所有形式的创新都必须服务于红色文化核心价值的准确、严肃传递,坚决避免了为追求趣味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我们注重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让云端激发的感动在主题班会、课堂讨论中得到沉淀与升华。此外,我们积极推动家校协同,鼓励学生将作品带回家中分享,通过班级群展示,从而将红色教育的影响力从校园辐射至家庭,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的良性循环。

展望未来,笔者坚信新媒体绝非稀释红色文化的溶剂,而是让其焕发新生命的广阔土壤。在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我们将继续深耕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探索如何让崇高的红色文化搭乘新媒体的翅膀,以更生动、更亲切、更富时代感姿态,飞入每个孩子的心田,让信仰的种子在数字时代茁壮成长,最终凝聚成为支撑他们一生的坚强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

耐药结核病患者的疾痛体验与因应之道

■ 李元来

一、引言

《安徽省结核病防治规划(2025—2030年)》提出,到2030年,肺结核患者标准化治疗方案使用率和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均≥90%。随着现代医疗技术发展和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完善,结核病已从“白色瘟疫”时代的“不治之症”变为一种“可防可治”的慢性传染病。然而,“生病”对耐药结核病患者意味着什么?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他们沦为医疗场域中的服务对象,社会控制机制下的角色傀儡。苏珊·桑塔格指出,疾病因其是生命的阴暗面而让人们获得一种更为麻烦的病人身份。从主体性视角出发,耐药结核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是有血有肉、有故事有态度,患病经历打破了他们的人生进程,让其体验多重性“患病之苦”。如凯博文所言,病痛成为其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于对耐药结核病患者疾痛体验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讨论因应之道。

二、耐药结核病患者的疾痛体验

(一)身心之苦

耐药结核病不只在生理上对患者造成伤害,而且在心理上给患者带来痛苦。耐药结核病患者不仅要忍受咳嗽、咯血、胸痛、乏力等临床症状,而且要承受反结核药物的不良反应。患者L说:“结核药确实是很累,吃得我都感觉人快没了,各种不舒服。”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伴随高度不确定感而来的是恐惧、紧张、焦虑、抑郁、易怒、失望、疑病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让病人备受折磨,甚至认为“得个绝症还还好”。

(二)求医之苦

耐药结核病患者遭遇看病难的问题。定点医院机构的结核门诊存在诊疗能力不足、诊疗规范欠缺等问题,优质结防医疗卫生服务资源过度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大型专科医院。患者B说:“到底怎么回事?不行就建议我去上海确诊!”。耐药结核病患者还遭遇非人性化诊疗所带来的痛苦。患者Z说:

“太难了!花100块挂专家号,就和你说了1分钟!”

(三)经济之苦

耐药结核病是名副其实的“富贵病”,其花费已构成“灾难性医疗支出”。根据世卫组织2018年所推荐的治疗方案,全疗程总费用高达56.17万-63.42万元。患者C说:“唉!病要命,钱也要命!这个病真的是要命伤财!一个人得了,可能这个家就完了。”

(四)污名之苦

耐药结核病不只是一种医学上的疾病诊断,更是一种社会上的污名烙印,耐药结核病患者中广泛存在着病耻感。这种病耻感不仅是病人体验到的一种个体内心感知,更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性歧视。患者S说:“‘痨病鬼’各种被嫌弃,这病太恶心了!回了趟老家,感觉别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三、耐药结核病患者疾痛体验的因应之道

(一)病友疗愈

构建耐药结核病患者的同伴支持系统,利用病友关系进行互助疗愈,化解身心之苦。一方面,老病友作为“负伤的疗愈者”从切身经历出发,分享耐药结核病的治疗经验、副作用应对方法、健康管理措施;另一方面,共同的病人身份既拉近了耐药结核病患者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也让他们拥有共同话题和共同体验,更能感同身受,从而共享资源、携手抗核。

(二)医学转向

病友在“常人疾病观”下的互助疗愈无法替代专业的医学诊疗。为了更好地满足耐药结核病患者的求医需求,既要完善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优化结防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发展“远程医疗”技术,提升基层结核病防治所的诊疗水平,从根源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又要从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学模式,转向以病人为中心的生物学—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优化诊疗流程,通过叙事

医学增进对耐药结核病患者的人文关怀。

(三)国家兜底

将耐药结核病的防治纳入国家兜底保障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解决“灾难性医疗支出”问题,防止因病致贫或返贫。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扩大主动筛查范围,从源头进行控制。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支持研发新药,确保治疗可及性。强化基本医疗保障,对全口服短程方案的核心药物不设支付比例,全额纳入医保报销目录。设立耐药结核病专项医疗救助基金,进行兜底补偿。

(四)社会关怀

基于隐私保护和反歧视的法规和政策,将社会关怀纳入耐药结核病防治指南方向,为康复的耐药结核病患者回归生活、融入社区、继续学习与工作提供支持性服务。开展“去污名化”运动,利用每年的3月24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精准科普耐药结核病,重塑公共叙事,将人与疾病分开,消除“痨病鬼”类的污名。

四、结语

耐药结核病患者不只是从医疗层面,更是从日常生活的影响角度来理解患病,生病对于他们而言即生活的全部,他们的生命本体经验是被疾病经验重新改写的生活故事。林耀忠认为,疾病不只是个人的事件,同时也是社会的事件。耐药结核病患者对自我和自我的社会经验构成疾病体验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仅需要处理自身的疾病状态,还需要处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不断遭遇身心、求医、经济和污名之苦,故此需要从病友疗愈、医学转向、国家兜底、社会关怀方面理解与回应他们的多重疾痛体验。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耐药结核病患者的疾痛体验与网络互动研究》(项目编号: AHSKY2021D73)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以中国最美乡村婺源为例

■ 娜菲沙·吐尔孙江¹ 吐马尔斯·吐尔孙江²

一、引言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婺源考察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婺源作为全国首个“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示范县,拥有徽派建筑集群、油菜花海生态景观与徽文化非遗资源,其乡村旅游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历经“观光型—体验型—度假型”的转型。然而,随着旅游开发强度的提升,婺源也面临着“旅游依赖症”“文化商业化异化”“生态超载”等共性问题,如何在乡村振兴框架下实现旅游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理论意涵

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等为核心要求,乡村旅游是其重要产业支撑,二者理论上紧密关联、共同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

(一)乡村振兴的理论界定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乡村振兴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有机统一;“产业兴旺”是基础,需推动乡村产业从“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转型;“生态宜居”是前提,需保护乡村自然生态与人居环境;“乡风文明”是灵魂,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有效”是保障,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体系;“生活富裕”是目标,需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与生活质量提升。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单纯追求经济收益。

(二)乡村旅游的理论界定

依据《旅游学刊》的定义,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为资源,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客群,以体验乡村生活、感受乡村文化为核心需求的旅游活动”。其核心特征包括:地域属性(依托乡村空间)、资源属性(依赖自然与文化资源)、功能属性(兼具经济、文化、生态功能)、主体属性(需村民参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从“观光消费”转向“价值共创”,强调旅游与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的深度融合。

三、婺源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婺源依托徽文化与生态双重优势,乡村旅游成效显著,带动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但当前其发展仍存在深层矛盾,需要具体分析。

(一)婺源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第一,从资源禀赋方面看。婺源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是古徽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之一,其旅游资源具有“生态稀缺性”与“文化独特性”双重特征:在生态资源方面,婺源拥有“中国最美乡村”的生态基底,油菜花海、梯田茶园、古树群构成了“春看花、夏避暑、秋赏枫、冬品雪”的四季景观;在文化资源方面,婺源保留了300余座徽派古村落(如江湾、李坑、汪口),拥有徽剧、傩舞、徽派木雕等10余项国家级非遗,以及“徽商文化”“耕读文化”等深厚的文化底色。

第二,从发展阶段方面看。起步期(1990—2005年):以“古村落观光”为主,依托李坑、汪口等古村落开发简单观光产品,游客以周边城市短途游为主,旅游收益以门票收入为主;成长期(2006—2015年):引入“生态+文化”概念,打造“油菜花节”品牌,推动“门票经济”向“住宿、餐饮”延伸,政府主导成立婺源旅游集团,统一管理核心景区;转型期(2016年至今):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探索“非遗型”旅游,开发民宿集群、非遗体验项目(如篁岭晒秋),推动旅游与农业、文创产业融合,但仍未突破“季节性依赖”与“产品同质化”瓶颈。

第三,从发展成效方面看。在旅游带动下,婺源乡村旅游取得阶段性成就:首先是产业兴旺,全年全县接待游客2803.7万人次,综合收入达276.2亿元,带动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发展,如“婺源绿茶”通过旅游渠道销量逐年增加;二是生态宜居,旅游开发推动基础设施改善,2023年森林覆盖率达83.67%;三是生活富裕,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760元,比上年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73元,比上年增长8.6%。

(二)婺源乡村旅游发展的深层问题

尽管婺源乡村旅游取得成效,但在乡村振兴“全维度”要求下,仍存在五大深层矛盾。

一是文化传承异化,原真性丧失与商业化超载。徽文化是婺源旅游的核心资本,但当前面临“异化”风险:首先是物质文化资本失真,部分古村落为吸引游客,将传统徽派民居改造为“网红打卡点”;其次是人力资本流失,年轻一代村民更倾向于从事旅游服务,而非传承徽剧、木雕等非遗技艺;最后是文化体验表层化,多数非遗项目仅以“表演”形式呈现,未让游客深度参与,导致文化价值被“符号化”。

二是产业融合浅层化,产业链短与附加值低。婺源乡村旅游仍停留在“观光+住宿”的浅层融合阶段,未形成“三产联动”的完整产业链:首先,旅游与农业融合不足,农产品多以“初级产品”形式销售,缺乏“旅游+文创”的深加工;其次,旅游与文化创意融合不足,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基于徽文化的原创设计;最后,旅游与康养、研学融合滞后,生态资源未转化为康养产品,研学产品仅以“参观古村落”为主,缺乏“耕读体验”“非遗学习”等深度内容。

三是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村民“被边缘化”与利益分配失衡。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但婺源仍存在“参与不足”问题:首先,决策参与缺失,核心景区(如篁岭)的规划由外来企业主导,村民仅通过“听证会”形式参与,未真正拥有决策权;其次,运营参与单一,村民多从事“低技能、低报酬”的服务岗位(如保洁、保安),而“高技能、高报酬”的管理、营销岗位多由外来人员担任;最后,利益分配不均,旅游收益主要流向企业与政府,村民仅通过“房屋出租”“门票分成”获得少量收益。

四是生态承载失衡,游客超载与保护不足。随着游客量激增,婺源生态系統面临“超载”压力:首先,核心景区容量超标,江湾、篁岭等核心景区节假日游客量超最大承载量;其次,生态保护措施滞后,旅游交通以燃油车为主,碳排放量大,部分民宿存在“污水直排”现象;最后,生态教育缺失,游客与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薄弱,乱扔垃圾、刻画古建筑等行为频发。

五是品牌同质化,特色弱化与竞争加剧。婺源虽以“中国最美乡村”为品牌,但面临“同质化竞争”压力:首先,产品同质化,与浙江乌镇、安徽宏村等古村落旅游地相比,婺源的核心产品仍为“古村落观光+油菜花”,缺乏独特的体验项目;其次,品牌传播单一,依赖“油菜花节”单一IP,淡季(11月~次年2月)游客人次较低,导致“季节性闲置”;最后,区域协同不足,未与黄山、千岛湖等周边旅游地形成“徽文化旅游带”,各自为战,加剧了竞争压力。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婺源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

结合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与婺源现存问题,提出婺源乡村旅游优化路径。

(一)文化赋能:激活徽文化资源,实现“乡风文明”

以“保护—活化—传承”三维联动推动徽文化活态传承。从保护维度上看,分级划定古村落“核心保护区”与“协调发展区”,核心区仅允许“修旧如旧”修缮,协调区适度开发配套且契合徽派风格。设立政府、企业、社会资本共投的徽文化保护基金,保障古民居修缮与非遗补贴。从活化维度上看,在江湾、篁岭等景区建“非遗工坊”集群,邀请传承人驻场教学,推动游客从“观看”转向“参与”。从传承维度上看,开展“非遗进校园”,在中小学开设傩舞、剪纸等课程,选拔“非遗小传承人”。完善制度文化资本,联合高校设立“徽文化研究院”,挖掘耕读文化、徽商精神当代价值。每年举办“徽文化国际论坛”,提升婺源徽文化核心地影响力。

(二)产业融合: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兴旺”

以“旅游+”推动多产业深度融合,构建高附加值产业体系。从“旅游+农业”角度上看,打造东部山区“梯田茶园观光区”,开发绿茶文创礼盒、徽州糕点伴手礼,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从“旅游+文创”角度上看,设“徽文化创意设计中心”,邀请设计师开发徽派元素文创,举办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利用VR还原古村落百年生活场景,推出古村落NFT数字藏品。从“旅游+康养”角度上看,在北部山区建“森林康养基地”,推出森林浴、中医疗疗套餐,引导民宿转型“康养型”,提供晨练、冥想、食疗服务,开辟“养生菜园”。

(三)社区共建:完善参与机制,实现“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

以“社区主导”构建全流程参与机制,保障村民收益。首先,成立“婺源乡村旅游联合合作社”,村民以房屋、土地入股,参与旅游规划,每季度召开“旅游听证会”,邀请多方代表讨论问题并公开结果。其次,政府与企业联合开展“村民技能培训”,提供民宿装修补贴、文创创业贷款,支持村民创业。最后,企业净利润适当用于村民分红,按入股份额与参与度分配;从门票收入提取恰当部分设立“旅游公益基金”,改善村落基础设施。

(四)生态可持续:平衡开发与保护,实现“生态宜居”
以“生态优先”落实三举措。首先,控制游客容量,核心景区实行“每日预约制”,按承载量设限;通过淡季优惠、开发冬季产品,推动错峰旅游。其次,发展绿色旅游:景区投放电动观光车,建自行车绿道,要求民宿用可降解餐具,保护修复旅游受损区域,种植本土植物。最后,开展生态教育:景区设生态解说牌;每年组织村民生态培训,建立“生态监督队”。

五、结语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核心抓手,要契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婺源“生态+文化”模式有文化传承异化、产业融合浅层化等五大问题。解决需要构建“五位一体”路径:涵育文化赋能,产业融合+社区共建,生态保护+品牌差异化,注重研究未考虑数字技术影响,未来可结合实地调研与数字赋能促二者高质量转型。

(作者单位:1.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新疆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